从欧美到苏联的范式转换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头的考察与启示

Paradigm Shift from West to Soviet: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Urban Planning

许皓 李百浩
Xu Hao, Li Baihao

摘要：20 世纪国际城市规划理论具有显著的跨文化传播特点。1949 年后城市规划的“苏联模式”经自上而下推介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近代都市计划的“欧美经验”并没有就此退出。本文通过搜集的历史文本与档案资料，考察 1949—1952 年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之间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结合“除旧布新”的概念阐释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回溯这段历史，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多个层面上的初始设定，也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因素。这一颠覆性的范式转换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亦可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历史维度的关照。

Abstract: International urban planning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fter 1949, the “Soviet Model” of urban planning came to China through top-down promo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did not be withdrawn. By collecting historical texts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opposition of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etween the Soviet Model and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from 1949 to 1952, and investigates the deep logic of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Looking back on this period of history can reflect the initial settings of many levels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and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today’s urban planning. This subversive paradigm shift and its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can also provide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concern for the current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reform.

关键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苏联模式；欧美经验；范式转换；规划史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Urban Planning; Soviet Model; Europea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Paradigm Shift; Planning Histor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代中国本土城乡规划学演变的学科史研究”（14BZS067）

作者：许皓，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城乡规划学博士
李百浩（通信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一般以 1949 年为界来区分近现代城市规划史。既有的叙述依据这样的断代史框架，以一种割裂的方式看待 1949 年前后城市规划的外来影响，普遍认为近代都市计划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现代城市规划则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审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头，实际上并非“苏联模式”一家之言，近代都市计划的“欧美经验”仍在延续。

本文通过搜集的历史文本与档案资料，考察 1949—1952 年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共存的特殊时期，揭示了二者之间理论的对立与实践的博弈，结合“除旧布新”的概念阐释范式转换的深层逻辑。回溯这段历史，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多个层面上的初始设定，也更容易理解今日城市规划成败得失的内在因素。这一颠覆性的范式转换及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亦可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历史维度的关照。

1 理论对立：新中国的“旧思想”

1.1 “以苏为师”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启蒙

1949 年 1 月，斯大林派特使来华期间，毛泽东就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愿望：“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1]。次年 2 月 14 日，两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拉开了新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序幕。

所谓“启蒙”，是指通过宣传、教育，使人接受新事物，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相较于近代参照日本的“都市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使用的“城市规划”一词本身即属于新添设的学科概念^[2]。于是普及基本概念，对规划从业者进行思想启蒙，使他们获得基础的、入门的城市规划知识就显得十分必要。有关城市规划的启蒙主要通过苏联专著的“理论译介”与苏联专家的“讲演介绍”两种形式进行。

就苏联专著的“理论译介”而言，最早解放的东北人民政府，最先开展了译介苏联城市规划专著的工作。1951 年 5 月，东北卫生部何宾健翻译完成了《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1945 年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随即开启城市重建。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苏联已积累了不少战后重建的经验，这对即将展开大规模建设的新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1952年5月，林微因、梁思成译介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表1)。

就苏联专家的“讲演介绍”而言，1950年3月16日，希马柯夫和巴兰尼克夫在上海期间作了《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的问题》的报告，在城市职业分类上，首次提出基本人口、被抚养人口、服务人口的概念，并介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与用地规模推算方法。另外，据赵瑾回忆：“(苏联规划专家)穆欣讲的很清楚，我做报告，你把市委书记请来，他就是要宣传城市规划是怎么回事”^[3]。可见，这种思想启蒙不仅针对规划技术人员，也对政治精英接受城市规划起到了关键作用。

1.2 尚在延续的近代欧美“都市计划”理论

中国近代都市计划具有深厚的欧美渊源。近代中国政治家倾向于委托欧美规划师主持重要城市的规划。典型的如1927年《南京首都计划》聘请美国人墨菲(H. K. Murphy)

和古力治(Ernest P. Goodrich)为顾问。1940年代末《大上海计划》邀请德国人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参与。整体而言，自19世纪末欧美城市规划从建筑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欧美大概有两股城市规划思潮影响着中国近代都市计划。

一是源自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为尽快改善近代城市肇始状态恶劣的物质环境，城市美化运动及其代表的宏大空间美学，很容易被近代社会精英所接受。事实上，中国市民私人领域感不强，长期以来处于集权政府统治下，也较为容易接受城市美化运动所带来的大规模物质空间干预^[4]。

二是源自英国的田园城市受到近代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董修甲、张维翰相继译介了田园城市理论^①。经由他们的传播推广，乌托邦的田园城市思想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演化为卫星城市、功能分区、住宅改良、公园建造、防空城市等规划设计原则^[5]。

政治体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化，但科学技术却无法一夜之间实现突变。就城市规划而言，尽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近代源自欧美的都市计划理论在新中国仍有

表1 新中国初期出版译介自欧美与苏联的城市规划专著

	《城市计划大纲》(1951)	《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1951)	《工人住宅区设计》(1951)	《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1952)
第一章	定义和引言	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	住宅区的居民数及居住面积计算	我们的祖国和她的侵略者
第二章	城市的四大活动	交通管制学	房屋附属地区的型及大小	重建的工作
第三章	居住是城市的第一个活动	城市计划学	住宅区的建筑	市镇住宅部分之重建
第四章	工作	道路设计	绿化地带及体育场	市镇计划
第五章	游息	旧城市道路布置的研讨	社会性设施	斯大林格勒之重建
第六章	交通	旧城道路布置的改良	住宅区的总计划及建筑样式	罗斯托夫和窝罗内兹之重建
第七章	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	城郊区道路的布置	中心地基广场的构成	加里宁、斯莫棱斯克之重建
第八章	总结	乡间及村庄的道路	住宅区街路	乌克兰之重建
第九章	—	总结	住宅区附属地带	村庄之重建
第十章	—	—	交通联络	设备与材料
第十一章	—	—	地域的选择	来自后方的支援
第十二章	—	—	整顿工程及福利设施	解放区内苏维埃文化之重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1925年董修甲发表题为《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的文章，对各国田园城市实践进行了对比总结，首次探讨了“我国应否采用田园新市制度”的问题。1927年张维翰译介的《英国田园城市》阐述了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协会规定的田园城市基本要素，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田园城市理论的专著。

延续。

1949年6月11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提出:“为求使四大功能得到最合理的隔离与联系,我们吸收近十年来欧美的经验,应当用四种不同的体形基础:分区、邻里单位、环形辐射道路网、人口面积有限的自给自足市区”^[6]。可见,在梁思成有关新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构想中,欧美经验占据了主导。

实际上,1949—1952年间有关城市规划的专著,源自欧美的经验占据了主导地位。典型的如1951年出版的《城市计划大纲》(成果源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CIAM在雅典举行的城市规划会议),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程应铨、朱畅中、胡允敬翻译。梁思成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一理论在西方被誉为一个技术良方,对于新生的中国,很有可取之处”^[7]。

同年12月,另一本西方规划专著《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翻译出版。原书作者屈普(Tripp)是伦敦警察总监,凭借多年交通管理经验,提出在区段内建立次一级的交通系统,以减少支路上的干扰。梁思成给予此书相当高的评价:“伦敦市是全世界城市中交通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随同这严重现象应景而生的论文与专著,源源不断地刊印出来,汗牛充栋。但是最简单扼要,能一针见血,最能解决问题的,当属这本”^[8]。

除了新出版的译自欧美的书籍,源自欧美的近代规划专著,仍留存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第一批来华的苏联规划专家,对欧美规划思想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也深有体会。巴兰尼克夫在编制北京城市规划期间专门指出:“现在北京图书馆和各建设机关,都没有这类的书籍。现有的美、英、日的各种资料与参考书都不适用”^[9]。

1949年后,经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推介,“苏联模式”来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与此同时,近代都市计划理论与实践中的欧美经验不会就此退出。因为尽管近代知识精英内心信仰社会主义,以及这一制度可能为城市规划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但归根结底欧美城市规划经验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1949—1952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也为多元理论并存的局面提供了现实基础。“欧美经验”与“苏联模式”之间,由此呈现一种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城市规划理论层面,亦体现在城市规划实践的博弈之中。

2 实践博弈:基于重要城市规划事件的分析

2.1 苏联方案与梁陈方案:“经济实用”取代“功能主义”

1949年底“北平”已复名“北京”,取代南京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命名的改变,预示着城市职能与性质的彻底更新。在物质空间上重构北京,就显得格外必要。来华的第一批苏联规划专家,首先关注的即是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①。

面对这座特殊的历史城市,虽然“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红墙黄瓦的建筑”为新中国提供了权力的象征与合法性基础,但对新生政权而言,这些因素恰恰是革命的对象。北京作为全新意义的政治中心,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传统城市符号”,在规划设计中如何对待“旧城”并赋予新的内涵?

基于经济性的考虑,苏联专家提出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认为行政区的布局,应通过重建、改建前朝所使用的空间形式,在旧城内部解决。在《改建莫斯科规划》编制过程中亦有“旧城旁新建城市”的方案,但最终遭到苏联官方的否定。基于这样的经验,苏联专家在论述行政区选址时,以莫斯科经验为例,指出在旧城建造行政中心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在城外新建成本的20%~30%^[10],以此说明北京在旧城基础上进行改建更为实际。

长期受到欧美规划理论影响的梁思成与陈占祥则提出了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的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基于“雅典宪章”的功能主义思想,认为行政区的布局应选址“旧城”以外,通过分区与疏散实现,加之旧城具有保存价值,因此建议在西城墙外的广阔市郊建立行政中心。

由于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建国伊始最迫切的是尽快将中央机构的布局确定下来,以保障开国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梁陈方案”在时间上不允许,因为选址城外,几乎平地而起的新行政中心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最终的结果是,面对科学理性的长远考虑,实用主义原则以及对眼前问题的关照占据上风,随后编制的北京总体规划方案因此采纳了苏联专家有关行政中心的布局建议。

2.2 批判大上海计划:“既有城区扩张”取代“区域规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倡议下,上海市政府开始聚贤引外,共谋战后都市计划。就战后大上海都市计划参与者的学术渊源

① 1949年,随刘少奇访苏代表团回国的苏联专家抵达北京。以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第一批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工作组开始为首都建设做准备,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

而言,主持者陆谦受和鲍立可,以及工务局聘请的工程师均有着深厚的欧美城市规划渊源^①。一定时期的城市规划范型必然受到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但最终还是要落到规划制定者所秉持的城市规划理念上。上述近代知识精英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制定过程中,始终秉持着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念。区域规划、有机疏散、卫星镇等当时欧美盛行的规划概念,成为历次技术座谈会的核心议题。

通过对这些概念的不断整合,1949年6月,历时四年、历经三稿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终于完成。关于上海未来城市发展,首任市长陈毅的观点似乎与大上海都市计划不谋而合,认为近代上海是个畸形的城市,想要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城市,就不能只在以前的十里洋场上打转,而要从整个上海出发来考虑^[11]。经由陈毅批示的“大上海计划三稿”得以刊印(图1),这不仅是对近代城市规划专家长期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他们所秉持理念的认同。

近代规划专家与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之间的这种默契,很快就被“一边倒”的“以苏为师”所打破。1949年后延续下来的近代欧美都市计划经验,在苏联规划模式介入后,开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苏联在华第一批城市规划专家,在提出与“梁陈方案”相左的方案后,前往上海指导城市规划

建设工作。《关于上海市改建及发展前途问题》(1950)意见书,及据此编制的《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1953)全面否定了基于欧美经验制定的大上海计划三稿(图2),认为这个方案是根据欧美城市发展经验拟定的,指出该方案为防止中心城的过度膨胀,围绕市中心建立的卫星城镇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徒劳”。认为现代化交通工具与道路网络的便捷,反而会将新、老市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城市,进而提出最适合上海的城市改造方法是“既有城区扩张”^[12]。

2.3 一汽生活区:“社会主义街坊”取代“邻里单位”

1929年,美国人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的“邻里单位”是继田园城市后,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又一典范。伴随美国影响力的扩大,该理论逐渐成为战后住区规划的主导范式^[13]。就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土壤。在近代自主编制的《大上海计划》和《十年陪都计划》里,“邻里单位”均有所体现。1949年后,“邻里单位”曾被梁思成认为是“某种限度之下能自给自足的小单位”^[6],在各地的城市规划方案编制中,也都倾向于将“邻里单位”作为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单元。典型的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在空间形态上呈现了一种因地制宜的自由式布局(图3)。

图1 大上海计划三稿(1949)

资料来源:侯丽,王宜兵.《大上海都市计划1946-1949》——近代中国大都市的现代化愿景与规划实践[J].城市规划,2015(10).

图2 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1953)

资料来源:侯丽.国家模式建构与地方差异——京沪两地1950年代规划编制的苏联影响之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17(2).

图3 依据“邻里单位”理论规划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

资料来源:汪定曾.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J].建筑学报,1956(2).

① 时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陆谦受留学于英国AA建筑学院。鲍立克在德国获得建筑学博士学位以后,将包豪斯的现代主义理念移植到中国,加入上海都市计划小组的同时,还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主讲“现代城市规划的原理和理论”课程。金经昌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1945年前就职于该校道路与城市工程研究所。黄作燊早年留学于英国AA建筑学院,后追随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并在那里完成学业。陈占祥作为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的学生,曾参与大伦敦规划的制定,并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意识形态对空间模式的选择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苏联规划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城市，应按照“街坊”来组织人民的社会生活，配置完整的服务网络。新中国引入苏联规划模式的同时，具有古典主义美学倾向的“街坊”也成为建国伊始住区规划的参照范式。1950年8月2日，重工业部聘请苏联专家承担第一汽车制造厂及附属居住街坊的规划设计^[14]。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苏式街坊，“一汽”生活区更多体现的是苏联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一方面，将人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集中配置的儿童游乐园、日托所、托儿所等设施，解决了工人的后顾之忧。这些设施使工人能够摆脱私人生活中的琐碎事务，而专心致力于生产。另一方面，规整的周边围合形制，取代了“邻里单位”的自由式布局，由此形成的古典主义布局，及其雄伟壮观的建筑形式，激发着人们对新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由衷自豪（图4）。

3 除旧布新：城市规划范式的颠覆性转换

3.1 规划范式转换的必要性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建国纲领，其中规定新政权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这意味着允许相当部分的“旧民主主义分子”进入政府。这类人对欧美科学技术，乃至文化留下的良好印象，并没有随着新中国成立而销声匿迹^①。正如陈云在与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的：“我们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工程师与专家，大多数都是政治观念反动、亲美的”^[15]。事实上，新中国初期确有知识分子认为苏联政治制度优越，但在技术上却更加认可欧美^[16]。

就城市规划行业而言，近代中国并没有开设该专业的院

校。1949—1952年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也大多是在欧美接受的西式规划教育。相较于苏联城市规划，长期在欧美国家学习生活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或许对欧美城市规划更加认同。正因如此，城市规划界更可能存在“亲西方”“崇西方”的状况。如果任由多元的规划思想相互混合，将会导致规划理念的不确定性，各项规划政策的推行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对此，1952年9月举行的“城市建设座谈会”专门指出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从各地交换经验中可以看出，城市建设这一新的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多目标的建设工作，是关系到政治、经济、艺术各个方面的，不能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而盲目地依靠一些旧技术人员去做。我国现有的少数所谓专家多是从英、美学来的，他们不懂得建设如何体现我们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人民的城市，他们不能把城市建设从全局来考虑，使其服从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要团结使用这些人，但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工作”^[17]。

3.2 清扫欧美规划范式遗留

如果说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开启了中美关系的下坡路，那么1950年6月发生的“朝鲜战争”则让两国关系逼近冰点。在“反美”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主旋律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加快了清理欧美文化影响的步伐，批判、否定欧美思想文化的运动迅速展开。

欧美规划思想在新中国的命运由此面临重大的转折。规划从业者针对仍在理论与实践延续的欧美规划思想，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市规划思想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解放初期部分技术人员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影响

图4 依据“街坊”理论规划设计的长春“一汽”居住街坊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4]

① 当时知识界尤其对美国文化抱有好感，认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同，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

下摆脱出来,对住宅划分等级、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等规划方法还有很大的迷恋,否认城市规划应该为一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服务”^[18]。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开埠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该市城市规划建设系统由于未能深入贯彻苏联规划思想,而做出专门检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工作缺乏应有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由于受了英美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还顽固地存在着,表现在规划工作中,不认识到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其主导的因素是受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的;表现在规划思想上常常不自觉地忽视或抗拒苏联先进科学规划理论和经验的学习及采用。表现在规划思想领导上,没有对苏联专家历来对上海规划的建议组织认真的学习和切实的贯彻。因而,规划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观性及其迁就现状的改良主义错误倾向,也就必然发生了”^[19]。

面对新的政治气候,那些深受欧美规划思想影响的知识精英,也面临着思想改造的要求。1952年5月梁思成公开发表了《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一文,检讨了其思想中的西方底色:“我认为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过来的人,我的脑子里还残留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在都市计划概论课程中,我口口声声地讲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历史唯物论者,是进步的。我其实所讲的社会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以抵制所怕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那就是我所崇拜孟福德(Lewis Mumford)和沙理能(Eliel Saarinen)的理论,是完全本末倒置,违反发展规律的理论,完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但我如果不能掌握唯物辩证的观点方法,我仍不能知道正确的政策方向,仍然会片面的纯技术观点处理一切。无论在教学上还是首都建设计划上,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20]。

3.3 彻底转向苏联规划范式

如果说在尚未开启“一五”计划的经济恢复期,对欧美规划理论残留问题的解决还不是十分迫切。那么在1952年底面临亟待展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规划任务,唯有“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规划经验,才能够消除欧美城市规划的影响。近代都市计划的发生与发展在经历了以英为师、以日为师、以美为师等发展模式之后,也只有全面的转向苏联规划模式,才能够统一多种来源的规划思想,高效地推进新中国的首轮工业化计划。

会议是统一认识,传达贯彻方针政策,布置当前任务的一种工作形式。每一次会议都有不同的目的、内容和意图,传达着阶段性的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举办各式会议成为规划范式确立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关城市规划苏联模式与欧美经验两种范式的讨论,最终上升至中央层面的

专门会议。1952年9月举行的城市建设座谈会从政治的高度对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做出了指导思想的整顿与规范,尤其强调“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经验^[21]。同年10月刘秀峰的讲话也再次指出:“一切城镇规划设计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反对欧美式资本主义市政建设观点,这是城市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思想上必须解决的问题”^[17]。

在这些会议上,城市规划“以苏为师”作为一种行业共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此后,苏联城市规划经验成为正确的理论指导,源自欧美的经验被就此抛弃,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现了向“苏联模式”的集体转向。

4 历史关照现实:若干反思与启示

4.1 范式的“除旧布新”与“渐进变革”

追溯新中国伊始的规划史,可以看到1949—1952年间从“欧美经验”到“苏联模式”的范式转换是一次“除旧布新”或“另起炉灶”式的彻底革命。这一时期有关欧美规划理论的一切均遭到质疑和批判。但仅仅五年之后,面对新的政治环境与实践需要,某些欧美规划经验再次被运用到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之中。例如:尽管新中国伊始苏联专家认为近代大上海计划的区域规划思想,并不能解决上海的问题,但1959年上海却专门编制了《上海区域规划示意图》^[22]。再如:“以苏为师”背景下被苏式“街坊”取代的“邻里单位”,在1957年经由宋元瑾和陈占祥的译介再次被引入^[23],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居住小区规划的新范式。

如上所述,如果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知识体系是一个工具箱,那么这个工具箱在初期是由“苏联模式”提供的,1950年代后期也在吸收欧美的某些经验,最终回归到一种混合的多元谱系。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城市规划作为一门专门知识,实际上始终有其“内核”,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尽管一些概念在某一时期遭到抛弃或禁止,但并不妨碍这些概念在其他时期从“内核”中被抽取,用以支撑当时当地的城市规划行动。

这段历史发展的经验,能够赋予今日的经验是,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不必采用“除旧布新”甚至“另起炉灶”方式。城市规划有其知识基础与职业传统,即便改朝换代,其体系犹在。今日规划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在一个新的框架下以既有城市规划的内核为基础,汲取其他空间规划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而不断发展演进,以既有城市规划职业传统为核心,开放包容地与其他规划职业交叉与交融,进而“渐进式”地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

4.2 “多源统一”到“多规合一”的轮回

中国近代都市计划不是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传统的自然延

续,而是随着“西学东渐”潮流从欧美移植而来,具体来说,英、美、德、日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4]。因此,近代中国都市计划具有多个范式渊源,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理论谱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52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的“过渡期”,这为多元理论谱系并存的局面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苏联规划与欧美规划毕竟属于异质系统,代表不同的观念形态、思维模式、技术操作。如果任由两种思想相互混合,将会导致规划理念的不确定性,各项规划政策的推行也必然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家的第一个工业计划亟待展开,拟建现代工业区占地巨大,有关功能区划、工业协作、交通组织等问题,在“冷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似乎只能依赖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此时,一个谋求发展的新生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现代化失意之后,急需在城市规划理论上破旧立新,统一思想。为全力推进国家的第一个工业计划,“多源统一”的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回观当下的“多规合一”,似乎是新中国初期城市规划理论“多源统一”的历史轮回。两次变革都需要立足于一个共识性的平台,这个平台在新中国初期是清扫欧美的规划思潮,全面参照苏联的范式,而今天则是统一多个平台上的标准与规范,建立多个空间性规划融合为一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历史地看,两个不同时空的创举几乎有着相似的缘由,“多规”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快速城镇化以来空间性规划的“政出多门”,“多源”问题的根本则是近代以来多个对外参照对象的“历时性叠加”。

4.3 城市规划与政治体制的“相互依附”

观察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在19世纪下半叶的起源,欧美规划师首先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然后才被国家权威整合收编^[25]。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则与西方不同,规划师职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内部的组织化中运行。在城市规划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依附于政治体制的设定,决定了从业者必然要对国家政策目标的变化高度敏感。

在新中国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奉行“以苏为师”政策便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对于欧美经验,尽管大多深受其影响的近代规划专家多有认同,但也不得不保持批判的姿态。面对苏联城市规划,无论规划工作者内心是否有疑虑或对抗,表面上也只能顺从。特别是在“公私合营”以后,近代多元化的个体话语被极大地削弱,国家成为规划设计活动的主宰者^[26]。此时的规划工作者,无论是供职于规划技术部门,还是供职于规划管理部门,亦或是供职于高等院校的规划专业教师,均是体制内的“单位人”。依附于政治体制的

城市规划行业,更需将“以苏为师”的国家政策贯彻到位。当然,城市规划行业如果脱离政治体制,又将极大制约其所发挥的社会效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获得国家权力的支持与授权,城市规划知识才具有转化为行动的前提。

今天,我们不能也不必改变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政府内部组织化的初始设定,但在具体的城市规划活动中我们仍要警惕,在规划理念与政治目标相冲突时,将对政策目标的服从和维护视为政治任务。这种把城市规划全然等同于政治活动的行为,只能让市规划行业失去话语权,越来越被动。事实上,如何平衡城市规划技术作用与政治的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尽管绝对的平衡难以保持,但对其的思考和相对位置的找寻,应是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不容逃避,且在职业生涯过程中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4.4 公共利益属性的“错位”与“回归”

追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城市规划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城市发展无序、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彰显了“公共利益”属性。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始阶段,规划范式之所以全面转向“以苏为师”,是由于工业化战略目标的迫切需求。“跟着工业项目走”的定位,使城市规划成为单向落实计划需求的技术工具。基于国家工业计划的“建设意志”,取代“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的实际内涵。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地方分权分税的制度框架与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全面启动了高速城市化与大规模城市建设。在此过程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解释不断泛化,大量土地在“发展经济”的口号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被征收^[27]。城市规划亦突出了对经济与效率的追求,而忽视了公共利益,成为“为了增长的规划”。

习近平在与青年干部的谈话中提到,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抓好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也会扣错。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初期与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又何尝不是“前两粒扣子”。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最初孕育时期与后续成长阶段,外部条件使其不具备公共利益价值属性。由特定历史情境所造就的基本价值观的两次“错位”,有待在新的历史时空被纠正。

当下,我国已进入新常态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新时代城市规划最需要的是“回归初心”,其核心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经历城市规划的“建设意志”与“经济利益”导向之后,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城市规划需要“回归”现代城市规划的初心——公共利益,尽可能彰显社会理性,以实现人民生存权力的公平公正。UPI

参考文献

- [1] 郭文韬. 开国前后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3.
- [2] 李浩. 术语定名“城市规划”专业名词之来历 [J]. 城市规划, 2017(8): 132-134.
- [3] 李浩. 城·事·人: 新中国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4] 冯琼. 政商博弈视角下的汕头近代城市规划研究 [J]. 城市规划, 2015(11): 62-67.
- [5] 吕金程. 田园城市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变容研究 [D]. 南京: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6] 梁思成. 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 [N]. 人民日报, 1949-06-11.
- [7] 国际现代建筑学会. 城市计划大纲 [M].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 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1.
- [8] 屈甫. 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 [M]. 程应铨, 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1.
- [9] 张敬淦, 徐以协.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 [M]. 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 1987.
- [10] 薛凤旋, 刘欣葵. 北京: 由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11] 孙怀文. 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2] 孙平. 上海城市规划志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13] 许皓, 李百浩. 思想史视野下邻里单位的形成与发展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4): 45-51.
- [14] 本书史志编纂室. 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 [M].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 [15]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6] 杨奎松.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10): 23-33.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基本建设投资 and 建筑业卷 [M]. 北京: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89.
- [18] 上海市城市建设十年总结初稿 (1959-08) [A]. 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号 B257-1-886) .
- [19] 城市规划思想的检查报告 (1955-05-27) [A]. 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号 B8-2-9-1) .
- [20]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4集)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52.
- [21] 李浩. 苏联专家穆欣与新中国首次城市建设座谈会 (下) [J]. 北京规划建设, 2018(4): 161-163.
- [22] 许皓, 李百浩. 重构苏联模式: 以1950年代中国城乡规划演变为中心 [C]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6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23] 吉勃德. 邻里单位的规划问题 [J]. 城市建设译丛, 1957(4): 16-20.
- [24] 李百浩, 韩秀. 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 [J]. 城市规划, 2000(12): 34-35.
- [25] 彭海东, 恽爽. 城市规划的职业化与政治特征——N.P.LOW 在《规划、政治和国家: 规划思想的政治基础》中的相关研究介绍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7(6): 114-118.
- [26] 赖德霖. 重构建筑学与国家的关系: 中国建筑现代转型问题再思 [J]. 建筑师, 2008(2): 37-40.
- [27] 乔艺波. 演进的价值观: 城市规划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流——基于历史比较的视野 [J]. 城市规划, 2018(1): 67-73.

(本文编辑: 许玫)